

澳大利亚的中国挑战

安东尼·韦尔奇

安东尼·韦尔奇 (Anthony Welch)：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件: anthony.welch@sydney.edu.au

澳大利亚大学系统有两个突出的特点，而且都影响着其在高等教育和研究发展方面与中国的关系。第一个特点：尽管澳大利亚的大学体系相对较小，总入学人数为 160 万，但根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来看，该国有 6 所大学进入了世界前 100 名，超过了人口更多的加拿大。第二个特点是澳大利亚留学生的比例异常高，2019 年留学生人数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27%。到截至目前，澳大利亚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是中国大陆地区。这两个特点实际上相关联，因为 2019 年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的 27% 来自于留学生收入。据估计，澳大利亚大学研究总支出的四分之一来自于留学生。

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入学率

几十年来，澳大利亚留学生招生人数一直持续增长，国际教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四大出口产业。但与此同时，这也使得澳大利亚大学严重依赖留学生的收入，尤其是来自中国留学生的收入。反过来说，这也是由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经费持续不足，促使大学寻求其他收入来源，特别是大力扩招收费留学生人数，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地区唯一一个实质性的英语教育体系。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使得前 10 个留学生来源国都是亚洲国家或地

区。2017~2018 年，澳大利亚来自国际教育的 324 亿澳元 (220 亿美元) 的总收入中，亚洲贡献了 222 亿澳元 (166 亿美元)，且其中大部分收入来自中国。在国家层面，中国大陆留学生占澳大利亚所有留学生的 40%，但在一些大学，特别是研究密集型“澳大利亚八校联盟” (Group of Eight) 中，这一比例额还要高得多。悉尼大学仅中国大陆学生就占了总入学人数的 24%。该大学在 2018 年赚取了 8.85 亿澳元 (6.64 亿美元) 的留学生费用，占整体收入的 35%。新冠疫情之前，在悉尼内城区 (inner-Sydney) 的三所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数量甚于美国加州所有 33 所公立大学的留学生数量。

中国技术移民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偏向于技术移民，这意味着中国移民现在属于高技术类别，这对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目前澳大利亚学术队伍中有 15% 以上来自亚洲，数据显示，2005~2015 年间，来自中国的学术人员数量增加了两倍。许多中国知识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在澳大利亚定居，他们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一支日益壮大的力量，往往与强大的中国研究体系及其一流大学有着良好的联系。

新冠疫情的后果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发生扰乱了上述体系中的大部分模式。旅行限制阻碍了留学生的流动，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 17 万名中国留学生签证持有人中，超过 60% 的学生在澳大利亚境外无法返回求学，其中许多人是在 2020 年初回家过春节的。持续的旅行限制意味着大多数人到 2021 年底都无法返回澳大利亚。这对许多大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那些中国大陆学生比例较高的大学。尽管许多大学迅速过渡到在线教学和学习，但整个行业 2020 年的总收入损失估计为 18 亿澳元，预计 2021 年将进一步达到 20 亿澳元。据预测，从 2020 年到 2024 年，该部门将损失 64~76 亿澳元可用于研究的收入。

突如其来的、持续的收入损失促使澳大利亚停止建设计划，大学削减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并抛售房产，特别是抛售现在经常空置的学生宿舍。尽管这一重大的收入损失和到 2021 年底流失约 3.5 万个相关工作岗位，然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一再从一项拟在疫情期间支持所有行业就业的款项中扣留对大学的财政支持。2021 年对公务员、副校长、部长和前部长的一系列采访发现了一个共同的解释。“这没有那么复杂。政府憎恨大学”。

合作与文化战争

中美关系的紧张和两极分化的加剧也影响了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关系。虽然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热衷于招收数十万名中国留学生，但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以及美国对其盟友施加的相应压力，都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竞争使得澳大利亚与中国脱钩的压力

倍增，尤其是在研究合作方面，竞争扭转了双边合作不断增长的既定模式，阻碍了中国即将成为澳大利亚在数学、工程和化学方面的主要研究伙伴。根据科学网（WoS）数据库，中国的科学崛起意味着中国科研文章的现有引用率仅次于美国。2019 年，中国在高被引作者数量上名列第二。这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研究伙伴；因为在上述学科领域中，这种共同合作的文章产生的平均引用次数比纯粹的澳大利亚出版物高出许多。许多这样的合著论文现在都有中国大陆的同事参与，其中有不少是在澳大利亚大学工作的中国知识移民。事实上，与中国同事合著的澳大利亚论文比例从 1996 年的 4% 上升到 2009 年的 14%。

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澳大利亚的国际合著论文比例为 45%，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35%。因此，对中澳学术关系的广泛限制将阻碍科学进步，限制两国的高等教育合作关系，并促使两极分化加剧。在 2018 年关于大学管理的演讲中，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八校联盟之一）校长和前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秘书概述了昆士兰大学与中国之间的科学合作程度。他指出昆士兰大学与中国有 3000 多份合作出版物，其中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指标（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的数量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然而，澳大利亚对大学与中国的联系进行了全国性审计，引起了大学对其钝化框架和行政负担的抱怨。

虽然个人层面的澳中双边合作大多继续进行，但机构合作，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现在受到更多的审查。虽然已经指出了合理的安全问题，但希望这些政策变化不应该危及更广泛的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